

林慶彰 主編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出版

中國學術思想

研究輯刊

五 編

林 慶 彰 主編

第 19 冊

拙齋經義論叢

宋 鼎 宗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拙齋經義論叢／宋鼎宗 著 — 初版 — 台北縣永和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9〔民98〕

序 2+ 目 2+224 面：19×26 公分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五編：第 19 冊）

ISBN：978-986-254-048-0（精裝）

1. 經學 2. 文集

090.7

98014957

ISBN - 978-986-2540-48-0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五 編 第十九冊

ISBN：978-986-254-048-0

拙齋經義論叢

作 者 宋鼎宗

主 編 林慶彰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市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封面設計 劉開工作室

初 版 2009 年 9 月

定 價 五編 20 冊（精裝）新台幣 33,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拙齋經義論叢

宋鼎宗 著

作者簡介

宋鼎宗，1942年2月生於臺灣南投，1968年6月畢業於省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1969年8月進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進修，師從大冶程發軔教授研習《春秋》學，1971年6月畢業，獲文學碩士學位。

1971年8月受聘於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歷任講師、副教授、教授，並擔任系主任、研究所所長等職。現在任職於：高苑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任教授。曾出版《春秋左氏傳寓禮嘉禮考》、《春秋胡氏學》、《春秋宋學發微》、《人文學論叢》等書，及文史哲論文若干篇。

提 要

本書之作，在透過對經義之詮釋進而落實經術之實用。作者長期致力於鑽研儒家經典不輟，此一論叢彙集自1976年迄2007年卅餘年間賡續有關儒家經學之論述，共計十五篇，大抵皆曾發表於期刊、學報及研討會等。

蓋各篇雖非一時之作，然無不貫串於學術思想史之脈絡中。凡所論說，往往不落俗套，而皆以孔子學說為基準，有本有源。義理、考據兼備，尤以通經致用為目標，務求能落實於國家社會。

本書主要內容，大致可以歸納為四項：

（一）儒家經典之形成：儒家為中國學術思想之主流，六經又為儒學之根據；歷代儒者或有推崇過度，反而令後學滋生困惑，不得正解。作者釐清穿鑿附會，探尋來龍去脈；提出「六經確立於漢，經學本漢家之學」之新見，以求正確認識經典。

（二）儒家經學之實用：證明經學有體有用，不徒為古代帝王緣飾政治之工具，乃一套修己治人之寶典指南；即使在當今之世，不論對個人或國家社會，仍可見其為有用之學。

（三）漢宋經學之成就：作者以為漢、宋經學為古今兩大流派，各有獨到之貢獻，未可輕易軒輊；須先分辨其得失利弊，進而加以截長補短，始能全面掌握經學之綱領。

（四）經學人物之衡論：給予孟子、荀子、張純甫等傳經之儒，較為公允之評價；摒棄成見，破除門戶，以求正確之認識云。

自序

錢賓四先生嘗謂：「孔子者，中國學術史上人格最高之標準，而『六經』則中國學術史上著述最高之標準也。」故凡欲研究中國之學、明孔子之術者，莫不自研究「六經」始。

若夫「經」之定義，前儒或言「經者，常也，言不變之常經也」；或謂「經也者，恆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故四庫館臣遂以「蓋經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一語，為兩千多年「經」部學術發展之總結。

故知「經」者本華族學術之母，是以諸子百家雖窮知究慮，各推所長，甚或借奇鳴高，標新立異，亦不過「六經」之枝葉與流裔；史家之貶天子，黜諸侯，討大夫，一字之褒貶，萬世榮枯所繫之「屬辭比事」，要亦師法於「六經」；至於文家之論說章奏，賦頌歌讚，詞章雖美，若非根於「經」而宗乎「聖」，則必行之不遠，而傳之不永也。

唯「六藝經傳以千萬數」本就「勞而少功」，況去聖久遠，文多殘闕，幸歷代皓首窮經之士，孜孜矻矻，彌縫補綴，或為傳箋詁訓，或為集解義疏；或以考據見稱，或以義理名世。於是，經術燦然明於世，而文化大國於焉而立矣。且歷代釋經之家，精銳盡出，著述之多，汗牛充棟，亦云富矣。

若考其衡論，雖各擅勝場，然亦不免受時空之局限，如：董仲舒者，以三綱、五紀等封建價值，以為出之於天，而謂「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或為時君服務，以求富貴，如賈逵者，附會文致，曲引左氏，以明劉漢為帝堯之後。或為自己之行止辯護，如杜預者，於「正色立於朝」之孔父，謂「內不能治其閭門，外取怨於民，身死而禍及其君。」於「不畏彊禦」，事君死難之仇牧，則曰「不警而遇賊，無善事可褒。」於「臨大節而

不可奪」之荀息，則謂「本無遠謀，從君於昏。」吾人讀此，不能無憾焉。若有宋之王安石著「三經新義」，假經義以排除異己，爲新法新政辯護，則又等而下之矣。

有唐韓文公愈，生當佛教昌明，釋氏之言盈天下之時，有感於社會、經濟之凋敝，傳統價值之崩解；雖於釋典之精微，未有極深研幾之功，乃出而力倡聖聖相傳之「道統」，以抗「佛統」，其志之堅，其氣之勇、其心之苦。後死者又盍興乎來！

有宋諸大師，非鄭註，去孔疏，視漢、唐之學若土埂，後儒以疑古、疑經短之。然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孔子以「至德」稱之，而《傳》以爲「內秉王心」；武王「觀兵孟津」，以待天命，而謂「退以示弱」；果如是，則文王、武王與曹操、司馬懿無以異矣。由此觀之，非宋儒之涵養義理，則聖賢將幾爲機械巧詐之徒矣。

若夫稱揚孟軻之內聖，貶抑荀卿之外王，或以孔、孟師儒之學，取代周、孔股肱之政事，則不僅學術之由實轉虛，且爲世局升降之一大轉關也。由此知訓詁、箋釋之難，讀經、解經之不易，而學者於微而顯，志而晦之際，不可不虛心明辨也。

鼎宗不敏，有幸執教於上庠，講授《經學史》、《經學專題》、《春秋左氏傳》、《論語》、《孟子》、《荀子》諸經典有年，爲求教學相長，於授課之餘，翻檢諸經籍而伏讀之，於先賢真知卓見外，凡有不契於心者，則爲摘錄，然後遍翻眾籍，或先儒成說，與時賢高明，博取約裁，以釋所疑，時日既久，堆積成篋。今不揣鄙陋，整理舊稿，編次成冊，付諸剞劂。既以就教於大雅君子，且期於「經義明」則「公理出」之經世大業，盡一得之愚云。

2008/9/28 教師節 宋鼎宗謹識於高苑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目

次

自 序	
壹、六經形成說	1
貳、談經說傳	23
參、經術與治術	33
肆、漢宋尚書學	41
伍、魏晉經學質變說	61
陸、尚書蔡傳初探	79
柒、宋儒尚書學之寓作於述說	101
捌、春秋「微言大義」試釋	123
玖、李總統「巧遇」蘇哈托	129
拾、論語「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解	135
拾壹、亞聖考徵	143
拾貳、韓愈「揚孟抑荀」說	163
拾參、四庫全書總目經部春秋類校讀記	173
拾肆、荀卿見斥於道統說	183
拾伍、張純甫「非墨崇儒」說	205

壹、六經形成說

一、前言

清儒討論六經形成者極多，乾隆進士章學誠首開風氣，一則說：「六經皆史也，古人不著書，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註1〕再則說：「周公成文、武之德，適當帝全王備，殷因夏監，至於無可復加之際，故得藉爲制作典章，而以周道集古聖之成，斯乃謂集大成也。孔子有德無位，即無從得制作之權，不得列於一成，安有大成可集乎！」〔註2〕是章氏以爲六經乃先王政典。故不得其位，即無制作之權；是以孔子雖聖，但「述而不作」而已。此即六經乃古官書，非孔子所得制作之說。

龔自珍繼之，既謂「孔子之未生，天下有六經久矣。」〔註3〕又謂「仲尼未生，先有六經；仲尼既生，自明不作，仲尼曷嘗率弟子使筆其言以自制一經哉！亂聖人之例，淆聖人之名實，以爲尊聖，怪哉！」〔註4〕龔氏既以「仲尼未生，天下早有六經」，與章實齋之說，可以前後共相發明。並進一步指斥後世因尊孔子而亂孔子「述而不作」之例，是「淆聖人之名實」。惜未明言官書或私學耳。

其後，善化皮錫瑞作《經學歷史》、《經學通論》，蜀人廖平作《今古學考》、《經學五變記》、《知聖篇》，南海康有爲作《新學僞經考》、《孔子改制考》，

〔註1〕《文史通義·易教上》（臺北：世界書局），頁1。

〔註2〕《文史通義·原道上》（臺北：世界書局），頁22。

〔註3〕《龔自珍全集》，第一輯，〈六經正名〉（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頁36～38。

〔註4〕同註3。

皆以爲六經乃孔聖道冠百王，師表萬世之作。於是，「經」遂爲孔子著作之專稱。孔子以前，不得有經；後賢譌述，但名「記」「傳」。一時傳誦，似爲學界定論矣。

晚近，餘杭章炳麟，又另樹新義，謂「《吳語》稱挾經秉枹，兵書爲經。《論衡·謝短》曰五經題篇，皆以事義別之。至禮與律獨經也，法律爲經。管子書有經言區言，教令爲經，說爲官書，誠當。然《律歷志》序庖犧以來，帝王代禪，號曰《世經》。辨疆域者有圖經，摯虞以作《畿服經》也。經之名廣矣！」〔註5〕據章氏之意，則官書稱經固當，然私家著述，亦得名經。於是，孔聖之作，後儒所述，一切古籍文獻，無不可以「經」名。甚至謂「經」，只是一種綫裝書而已。〔註6〕於是，儀徵劉師培氏之作《經學教科書》，遂有「古代之六經」、「西周之六經」與「孔子定六經」諸目。〔註7〕及馬宗霍之作《中國經學史》，雖稍加修正，〔註8〕猶區分「古之六經」與「孔子六經」之篇。殊不知「六經」之說，孔子不知，何況周公？

二、六經與先秦學術

（一）六經簡述

六經之學，自漢訖清，垂二千年有餘，今古文經學之紛爭，聚訟不已。然自清末民初，尤以殷墟文物相繼出土以來，學者之研究，有較多且具說服力之出土資料佐證，其成績已遠遠踰越前賢。而六經之面目，不再有威權無上之神秘性。讀之，亦較親切活潑，足以發文化之幽思，不再有無所適從之迷障矣。茲簡述六經之面目如下：

《易》：商代無八卦，殷人有卜無筮。筮法乃周人所創。〔註9〕考之卦辭、

〔註5〕 見氏著《章氏叢書·國故論衡》，中卷，〈原經〉（臺北：世界書局），頁451～452。

〔註6〕 《國學略說·經學略說》：「經之訓常，乃後起之義。韓非〈內外儲〉，首冠經名，其義殆如後之目錄，並無常義。今人書冊用紙，貫之以線。古代無紙，以青絲繩貫竹簡爲之。用繩貫穿，故謂之經。經者，今所謂線裝書矣。」（臺北：學藝出版社），頁37。

〔註7〕 見氏著《劉中叔先生遺書》，第四冊（臺北：臺灣大新書局），頁2355。

〔註8〕 馬氏《中國經學史》序云：「經者，載籍之共名，非六藝所得專；六藝者，群聖相因之書，非孔子所得專。」（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中國文化史叢書》。）

〔註9〕 余永梁〈易卦、爻辭的時代及其作者·二、商代無八卦及筮法之興〉，《古史辨》，第三冊，頁147。

爻辭，其內容有殷商祖先之故事，有周初之史事，而無戰國以來堯、舜禪讓，湯、武革命，與乎封泰山、禪梁父之傳說。〔註10〕則其作成於西周初年，蓋無疑矣。〈易傳〉，即所謂十翼，相傳為孔子所作，但宋儒歐陽脩已疑之。〔註11〕今人就其內容思想研究，以為〈彖傳〉、〈象傳〉、〈文言〉、〈繫辭〉等，要為戰國晚期之作品。若〈說卦〉、〈序卦〉、〈雜卦〉，則遲至西漢初年始完成者耳。

《書》：荀卿以為「政事之紀也」，其說或不可破。蓋《尚書》中屬西周諸篇，幾皆為誥命等公文。〔註12〕今本今文《尚書》之虞、夏書四篇，蓋為春秋末季至戰國晚期，儒者據傳聞資料著成者。商書五篇，蓋經周人文飾，或為殷商之後裔「宋國人所寫定者」。《尚書璇璣鈴》以為古書凡三千二百四十篇，孔子定可為世法者百二十篇。然「信而好古」，且「敏以求之」之孔子，於難得之古書，竟刪去三千一百二十篇，其不可信，先賢論之詳矣。〔註13〕

《詩》：詩之體裁，有風、雅、頌之別。其中以〈周頌〉較早，〔註14〕約為西周初期之作品。若國風則有遲至春秋中葉以後始完成者。〔註15〕《史記·孔子世家》謂：古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然鄭玄《詩譜》序、孔穎達《疏》，已謂「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是史遷「孔子刪詩」之說，不足憑

〔註10〕顧頡剛《〈周易〉卦爻辭中的故事》，《古史辨》，第三冊，頁1~36。

〔註11〕歐陽脩：「予謂〈繫辭〉非聖人之作。」《歐陽脩全集》（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頁121。馬端臨《文獻通考》：「歐陽公《童子問》上下卷，專言〈繫辭〉〈文言〉〈說卦〉而下，皆非聖人之作。」

〔註12〕見屈萬里《尚書釋義·敘論》（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社），頁3。

〔註13〕見屈萬里《尚書釋義·敘論》云：「緯書出哀、平之際，本多謬悠之說：此三千餘篇，經孔子斷取百二十篇之說，蓋仿《史記·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為三百五篇』之語而杜撰之。又因張霸有百兩篇《尚書》，故復造為『以百二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之語，其實皆無稽之談也。」（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社），頁2。

〔註14〕屈萬里《詩經釋義·敘論》：「三百篇的時代，就文辭上看，以頌為最早，大致都是西周初年的作品。」（臺北：華岡出版部），頁6。又氏著《古籍導讀》，亦謂：「鄭康成謂：周頌之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朱子以為亦或有康王以後之詩。按：執競言：『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成康，必當謂成王、康王；則朱說是也。三百篇中，以此一部分之作品為最早。」（臺北：臺灣開明書店），頁158。

〔註15〕屈萬里《古籍導讀》謂：「《秦風》十篇，蓋東周以來至春秋中葉之詩。」又謂：「《曹風》四篇，疑皆東周時之作品。」並謂：「《詩》三百五篇中，其著成時代，今日所能知者，此其為最晚者矣。」（臺北：臺灣開明書店），頁156。

信也。〔註16〕

《禮》與《樂》：禮本為宗教祭神之儀文，於君權神授之時，此祭祀之儀文，漸變而為政治之儀文，終成為貴族生活之習慣與方式，後更成為貴族養成教育之重要課程。孔子所謂「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註17〕蓋即指此。《左傳》桓公二年載臧哀伯諫納郕鼎於太廟。「所謂：昭其儉也，昭其度也，昭其數也，昭其文也，昭其物也。」莫不是禮。所謂「昭其聲」者，則樂是也。蓋「樂」、其始也雖緣人情之自然，其終也則伴隨「禮」而為政教之工具。若今本之《儀禮》、《周禮》、《禮記》諸書，錢穆先生於《中國文化史導論》，以為「《儀禮》十七篇，經後人考訂，其書應產於孔子之後。《周官禮》更晚出，應在戰國末年。大小《戴記》，……興起亦甚晚。」屈萬里先生亦同。〔註18〕

《春秋》：《春秋》本古史記之通名。史記而名曰春秋者，蓋殷商無四時觀念，但有春秋而無冬夏故也。〔註19〕及孟子謂「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於是，《春秋》遂由古史記之通名，轉為孔子著述之專稱。然考之今本《春秋》，始於周平王四十九（魯隱公元）年，訖於周敬王三十九（魯哀公十四）年，歷隱、桓、莊、閔、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十二公，凡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然郭公、夏五，不一而足。如非三傳，則不免「斷爛朝報」（王安石語），流水帳簿（梁啟超語）之譏。由此觀之，孔子是否作《春秋》，或已成為經學史之一公案矣。

綜前所述，知《易》、《書》、《詩》、《禮》、《樂》、《春秋》等典籍，要非成於一時，亦非成於一人。乃初民以來，世代相續之智慧與經驗之遺產，由

〔註16〕 屈萬里《古籍導讀》謂：「夫《國語》、《左傳》所記史事，大半在孔子以前，一部分當孔子之時，後於孔子之史事甚少。而所引之佚詩，與所引今存之詩相較，尚不及十七分之一。可知孔氏之說為可信而有徵矣。」（臺北：臺灣開明書店），頁148。

〔註17〕 《論語·為政》：「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註18〕 屈萬里《古籍導讀》於《周禮》，則謂：「戰國時人，據當時及前代之職官，復益以個人之理想，所撰成之政府組織法。」，頁171。於《小戴記》則謂：「其著成時代，早者當不逾戰國之世，遲者亦不逾西漢宣帝以後，則可斷言也。」，頁180。

〔註19〕 陳孟家《卜辭綜述》：「卜辭只有春秋兩字，而無冬夏。」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殷時尚無四時觀念。」陳、李二先生之說，足以推翻杜預「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之說。

後世子孫纂集而成者。特儒者乃藉之以發揚人文理想，皇家藉之以爲治術之準據。於是，此先民之文化遺產，遂風雲際會，由陳年文獻，一躍而爲永恆不變之常道，即所謂「經」矣。（註20）

（二）孔子與六經

孔子平生之志，本在「如有用我者，我其爲東周乎？」（《論語·陽貨篇》）故「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鄉黨篇》）然「明王道，干七十餘君」，終莫有用者（註21）。故孔子之偉大貢獻，不在得位行道，而在「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述而篇》）之「有教無類」（《衛靈公篇》）的教育家典範。今考《論語》所載，孔子設科教學，既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述而篇》），繼曰「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季氏篇》），終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泰伯篇》）。是孔門設教，要以《詩》、《書》、《禮》、《樂》爲主要之功課。

孔門以《詩》爲教材，故子貢因問「貧而無詔，富而無驕」而得「如切如磋」之精義；（《學而篇》）子夏因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而得「禮後」的啓發。（《八佾篇》）至於孔子對《詩》之看法，一則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爲政篇》）再則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子路篇》）由此觀之，孔子之時，《詩》之篇章，蓋與今本《詩》三百五篇，相去不遠也。（註22）

孔子教學之取材於《書》者，考諸《論語》，如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爲政篇》）曰：「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泰伯篇》）。曰：「高宗諒陰，三年不言。」（《憲問篇》）等是也。然上述篇章，均不在今文經二十八篇中。（註23）清儒陳蘭甫以爲「孝友施於有政，《書》之精義也。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數章，及堯曰咨一章，論堯、舜、禹、湯、文、武，《尚書》百篇，此題要也。」（註24）由此觀之，孔子之時，《書》乃歷史文獻，其數甚多。歷戰國之烽煙，秦火之浩劫，今日之《尚書》，蓋其劫餘也。

〔註20〕班固《白虎通議》：「經，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言不變之常經也。」

〔註21〕《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臺北：鼎文書局），頁509。

〔註22〕屈萬里《詩經釋義·敘錄》：「孔子既屢次說《詩》三百，可見三百篇必是當時魯國通行的本子。」（臺北：華岡出版部），頁9。

〔註23〕錢穆《國學概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頁15。

〔註24〕《東塾讀書記》，卷二，〈論語〉，《皇清經解續編》，冊14（臺北：藝文印書館）p10613。

孔子之言《禮》：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爲政篇〉）按：禮本古代宗教祭典之儀文，其後漸變而爲貴族生活之方式，與養成教育的功課。故禮本非一層不變者，是以，孔子「因革損益」說，深得「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註25）之精義。然此生活之儀節，若徒有形式，不有精神，必爲之僵化、呆滯。故孔子又說「人而不仁，如禮何？」（〈八佾篇〉）位居統治領導階層的貴族，既存仁善之心，其表現於進退揖讓間之儀文，必是有血有肉，活潑而精緻。由此觀之，孔子之所謂《禮》，非今本之三《禮》明矣。

孔子之言《樂》：《論語》載：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如也，純如也，嘒如也，繹如也。以成。」（〈八佾篇〉）是孔子於音樂之演奏，能深得其妙。又載：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述而篇〉）是孔子於音樂之感人，能心領神會也。復載「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子罕篇〉）則孔子於音樂，不僅感通神會，且能訂正音樂之謬誤。孔子音樂造詣之高，由此可知。惜後世不傳，學者不可得而論述焉。

孔子之言《易》：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述而篇〉）考《魯論語》「易」字作「亦」，讀作「加我數年，五十以學，亦可以無大過矣。」先漢之世，《論語》之版本有三：曰齊論、古論、魯論是也。雖各有優劣，但論者以爲《魯論》爲上。（註26）且「可以無大過」與「五十知天命」之意正合。則此又不足以證孔子學《易》之事。〈子路篇〉又載孔子之言，曰：「南人有言，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考「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見《周易·恆卦》九三爻辭。孔子之意，蓋謂「類此無恆心之人，不必去占卦」。足證孔子之時，《易》固爲卜筮之書，不有義理之高度也。徐復觀教授嘗謂「《易》得入於經學，與十翼有不可分之關係。若無十翼中的〈彖傳〉、〈象傳〉，而僅有卦辭、爻辭，則仍停頓於占筮者各自爲說的混亂狀態。」（註27）然〈彖傳〉、〈象傳〉爲戰

〔註25〕 見《史記》，卷九十九，〈叔孫通傳〉（臺北：鼎文書局），頁2722。

〔註26〕 又錢穆《國學概論·孔子與六經》：「今案：五十以學《易》，《古論》作『易』，《魯論》作『亦』，連下讀，比觀文義，《魯論》爲勝，則孔子無五十學《易》之說也。」本田成之《中國經學史》：「齊魯及古之《論語》，都有短長，但以《魯論》爲上，誰也無異論。」（臺北：古亭書屋），頁88。

〔註27〕 徐復觀《中國經學史的基礎》（臺北：臺灣學生書局），頁21。

國晚期之作，已見上文。由此觀之，《易》於孔子之時，不得為經明矣。

《春秋》：考之《論語》，夫子但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述而篇〉）所謂孔子作《春秋》者，孔子固未道及，弟子亦未嘗稱述。至孟子乃謂「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滕文公下〉）於是，世人方有知孔子作《春秋》者。然「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同上）要在《春秋》之筆削，有正名分、寓褒貶諸大義。特《左氏》宣公二年傳：趙盾弑其君。而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襄公二十五年傳，崔杼弑其君齊莊公。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由此觀之，正名分，寓褒貶，本古史官之職志與筆法，固不必待孔子。由孔子所謂「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可知。但正名分，寓褒貶，雖係史官之職志與筆法，求之現實，能有此風骨者，或不可多得。由《論語》：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憲問篇〉）；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季氏篇〉）；陳恆弑其君，夫子沐浴請討（〈憲問篇〉）諸章觀之：謂夫子有得於古史官之職志與風骨而欲發揚之則有之，謂夫子筆削《春秋》，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或未必然也。且夫子不云乎：「蓋有不知而作者，我無是也。」（〈述而篇〉）。

綜前所述，知孔子之時，無六經；孔子亦未嘗修六經，明矣。（註28）

（三）孟子與六經

《史記》謂：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諸侯。所如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歧《孟子題辭》謂：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是孔子之後，孟子與《詩》、《書》之關係最為緊密。

今考《孟子》七篇，引《詩》者三十，論《詩》者四。（註29）其目的：或為自己立說之依據，或為陳述歷史之事實。所發「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為得之」之高論，說者以為深得讀《詩》之法。

引《書》者十八，論《書》者一，又有似引《書》而不言《書》曰者。

〔註28〕 錢穆《先秦諸子繫年·孔門傳經辨》：「余考孔子以前無所謂六經也，孔子之門既無六經之學，諸弟子亦無分經相傳之事。」（香港大學出版社），頁83。

〔註29〕 見陳蘭甫《東塾讀書記》，卷三（臺北：藝文印書館，《皇清經解續編》），頁10628。

其論《書》一則，曰：「盡信書，不如無書。」（〈盡心下篇〉）由此觀之，孟子之時，《書》或未有定本也。

孟子之言《禮》，有明言禮者，有不明言禮者，有與人論禮者。考其內容，與今本《禮》書，或未必合。至謂「諸侯之禮，吾未之學」（〈滕文公上篇〉）者，蓋禮文繁博，隨時損益故也。（註30）

至於《樂》，孟子雖有「今之樂猶古之樂」（〈梁惠王下篇〉）之說，然終《孟子》一書，於音樂之道，但謂「獨樂樂，不如與眾樂樂」（〈梁惠王下篇〉）而已。

至於《易》之爲書，孟子則無片言隻字及之。此可證孟子不讀《易》，或《易》於孟子之時，未爲時人所重也。

孟子於六經形成之最大貢獻，厥爲《春秋》一書之發現。雖然《論語》不著《春秋》，但歷史爲孔子教學不可或缺之教材，學者無異論也。墨子則讀百國之《春秋》，（註31）是《春秋》，但爲古史記之通名。及孟子出，乃謂「王者之跡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離婁下篇〉）。是謂《春秋》乃繼《詩》而作，爲王道之綱紀者。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滕文公下篇〉）至謂：「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同前）又謂「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則《春秋》不僅爲孔子之專著，且字句之間，皆寓有微言大義矣。儒者之讀斯書者，遂不得不求「亂臣賊子」所以「懼」之「義」於字句間。於是，郭公、夏五，莫不有「微言大義」矣。

綜前所述，孟子之時，未有六經；後世所謂「六經」，孟子不知也。

（四）荀子與六經

儒家典籍，首著「經」字者，厥爲《荀子》，〈勸學篇〉所謂：「始乎誦經，

（註30）同前注，頁10629。

（註31）見《墨子·明鬼下》。墨子所讀之《春秋》，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孫詒讓云：「《國語·晉語》：『羊舌肸習於《春秋》』，韋注：『《春秋》，紀人事之善惡而目以天時，謂之《春秋》，周史之法也。時孔子未作《春秋》』。又《楚語》：『教之《春秋》，以感動其心』，《公羊·莊七年傳》云：『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何注云：『謂史記也。古者謂史記爲《春秋》』。《管子·法法篇》：『故《春秋》之記』，尹注云：『《春秋》，即周公之凡例，而諸侯之國史也』。《史通·六家篇》、《隋書·李德林傳》並引《墨子》云：『吾見《百國春秋》』。蓋即此。《史通》又云：『《汲冢瑣語》記太丁時事，目爲《夏殷春秋》，又有《晉春秋》，記獻公十七年事。』

終乎讀《禮》」是也。首以《詩》、《書》、《禮》、《樂》、《春秋》五部典籍，組成一體系者，亦爲《荀子》，同篇：「《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又謂：「《禮》、《樂》法而不說，《詩》、《書》故而不切，《春秋》約而不速。」〈儒效篇〉：「《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是也。

考〈勸學篇〉：「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按：所謂「數」，蓋指治學之程序、步驟言；所謂「義」，蓋指治學之目的、目標言。荀子之意，蓋依治學之步驟而施教之功課，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必有時而盡。若治學之目的，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此乃讀書人一生無盡之實踐過程。故曰：「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特「誦經」、「讀《禮》」，對稱爲文者，據下文云：「故《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觀之，蓋《詩》、《書》所以博學者之志趣，涵詠其情性者，若夫《禮》則在創制法度，典禮規範者，二者本不同科故也。而楊倞以《詩》《書》釋「經」，蓋亦得其旨。然則荀卿固以《詩》《書》《禮》《樂》《春秋》爲內聖外王之學，故曰：「在天地之間者畢矣。」

荀卿雖以《詩》、《書》、《禮》、《樂》、《春秋》等典籍，組成一內聖外王，體系完整之學，但《易》則始終不得與於其間。考〈非相〉、〈大略〉二篇，雖嘗三引《易》曰以爲說。^{〔註32〕}然論者或謂「弟子雜錄之語」，或謂引《易》諸篇，本不可靠（錢穆語）。^{〔註33〕}由此觀之，荀卿或嘗讀《易》，然《易》於斯時，地位固未能與《詩》、《書》、《禮》、《樂》、《春秋》等並配相侔也明矣。然則，荀卿之時，固未有六經也。

（五）其 他

儒家三大師外，其餘諸子，如《墨子》《莊子》等，於《詩》《書》諸典籍，亦時加稱述焉。茲簡介如下：

《墨子》：墨子生於孔子之後，孟子之前。故孟軻既敘孔子作《春秋》之後，

〔註32〕按：〈非相篇〉引「《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腐儒之謂也。」《荀子集解》（臺北：新興書局），頁33。〈大略篇〉：「《易》之咸見夫婦」、「《易》曰：復自道，何其咎」，同前，頁98～99。

〔註33〕楊倞《荀子集解》云：「此篇蓋弟子雜錄荀卿之語。」（臺北：新興書局），頁93。